

气候政策与投资保护的平衡：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例外条款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王瀚斌

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2052

【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加剧，各国正在推进诸如碳定价、碳排放交易及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前所未有的气候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常与《国际投资协定》（IIAs）中的投资者保护义务发生结构性冲突。本文系统评估了环境例外条款、监管权保留条款及国际习惯法上的必要性原则在保护国家气候措施方面的有效性。研究指出，传统 IIAs 普遍缺乏明确的气候豁免，仲裁庭对环境例外及必要性抗辩多采取严格解释，使得国家在实施去碳化法规时面临显著法律风险。以欧盟 CBAM 为案例，本文展示了碳关税类措施如何可能触发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FET）与间接征收等投资者主张，进而暴露出投资法体系在应对跨境气候政策时的制度张力。本研究提出应通过修订条约文本、增设专门气候豁免条款、重新界定投资者合理期待及强化国家监管权，以重构投资法与气候行动之间的平衡，使国际投资体制与《巴黎协定》等全球气候治理框架相兼容。

【关键词】国际投资协定；环境例外；气候变化；碳边境调节机制

一、引言

全球范围内，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纷纷推出淘汰燃煤、电力脱碳、碳税征收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政策。但这些环保措施往往与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国际投资协定（IIA）中作出的义务发生交织。传统 IIA 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免受政府武断、歧视性行为的损害，如提供不受非法征收影响、不低于公平公正待遇（FET）、国民待遇 / 最惠国待遇等保障。然而，这些条约条款可能间接限制各国实施强力气候政策的空间。随着气候监管趋严，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可能借助投资者 - 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挑战他们认为损害经济利益的环保法规，尤其在低碳行业。由此产生紧张关系：一方面，各国主张在追求环境保护等合法公共利益时享有主权管制权；另一方面，IIA 赋予投资者可诉权利，包括对征收的赔偿权、公平公正待遇权利，以及通过国民 /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非歧视保障。这种冲突在仲裁实践中已有体现，例如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下的 Methanex 案中，加州禁止含有 MMT（一种有害汽油添加剂）的法规被仲裁庭确认符合公共利益，但该庭未依赖任何环境例外条款，而是判断该措施因“出于善意、非歧视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构成征收。这一结果表明：仲裁庭往往会严格审视法规背景，即便认可环保目标，也只是在严格条件下放宽投资保护，而不会自动免除国家责任。因此，即便气候措施在道德和科学上站得住脚，在传统投资法框架下仍面临重大法律风险。

本文考察了环境例外条款和相关法律原则在国际投资协定下作为各国保障手段的作用，以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作为案例研究。CBAM 是一项旨在通过对特定进口产品征收碳成本来防止“碳泄漏”的标志性气候政策，体现了投资保护与环境监管之间的法律和政策紧张关系。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有的例外条款或习惯法抗辩（特别是必要性原则）是否能够充分保护诸如 CBAM 之类的气

候措施免受投资协定挑战。

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例外条款

历史上,大多数双边投资协定(BIT)或类似条约仅关注投资者保护,极少纳入环境例外。正因如此,当实施环保法规对在高碳行业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时,缔约方通常缺乏可用抗辩。近年来,这种缺陷引发关注,部分IIA开始尝试保留国家监管自主权。例如,不少新协定借鉴了关贸总协定(GATT)第XX条框架,允许必要措施以保护人、动植物生命健康及自然资源。2012年科威特-日本BIT就规定,缔约国可采取“为了保护人、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这一措辞与GATT XX类似)。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也在第8.15条中纳入一般例外条款,并于第8.9条重申缔约方为了公共利益(包括环境保护等)保留监管权。CETA第8.9条明确指出:“一方重申有权在本国领土内为达成合法公共目标(如保护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而进行管制”;其附件8-A进一步规定,“为维护合法公共利益(例如环境)而实施的非歧视性措施,不得构成间接征收”。类似条款还出现在中澳自贸协定(ChAFTA)投资章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投资议定书等新协议中。澳大利亚《中澳自贸协定》投资议题简报指出:协定包含多项保护政府合法管制的条款,包括允许非歧视性的公共健康或环保措施,以及专门的环境保护一般例外。AfCFTA投资议定书更进了一步,通过第24条(管制权)和第13条(国民待遇例外)明确将促进环境和气候行动的措施排除在协定适用范围之外。这些趋势表明,国际社会在新一代IIA中正逐步形成允许国家保留环境政策空间的共识。

然而,许多较早缔结的条约并未包含类似的例外条款。以NAFTA(1994年)为例,其投资章未纳入类似GATT XX的例外规定(仅在第1114条以宣言方式写明“各方不应为了吸引投资而降低环境标准”,但并无实质性免责条款)。在这种背景下,被诉国往往需依赖一般国际法中的抗辩。最常提到的是必要性原则: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第25条,国家可在遭遇“紧迫而严重的危险”且某措施是保护重要利益的“唯一可行办法”时免责。但该原则的适用门槛极高:国家须证明没有其他可行选项、自身未对危机造成贡献,且措施实施未严重损及其他国家利益。以往仲裁中很少认可此抗辩。即使阿根廷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发生时,多数庭审(如CMS诉阿根廷案)也拒绝接受必要性辩护。这意味着,虽然气候变化可被视为严重威胁,但由于其危害漫长且复杂,仲裁庭一般不会认定气候危机满足“紧迫性”要求。从法理看,新型IIA中出现的环境例外条款和国际习惯法抗辩虽在理念上为国家提供了一定保护,却在实际仲裁中范围狭窄且适用困难。这一法律格局为欧盟CBAM等措施的实施设置了背景:如果外国投资者因类似措施提起仲裁,国家难以依赖传统条款完全免责。

三、案例研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一) CBAM 的法律依据和设计

欧盟在“绿色新政”框架下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中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是核心贸易政策工具之一。CBAM的基本原理是:对进口欧盟特定碳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使国外生产者承担与欧盟本土产业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下相同的碳成本,从而防止“碳泄漏”。具体而言,欧盟要求进口商为产品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购买等额碳排放配额,价格与欧盟ETS碳价挂钩。外国产品缴纳的碳成本与欧盟内部排放成本等值,以保证公平竞争。CBAM初期覆盖钢铁、水泥、铝、化

肥、电力、氢能等行业，2023 年起启动试点仅要求报告，计划于 2026 年完全纳入财务缴纳义务。通过向进口产品内部化碳成本，CBAM 旨在阻止生产转移至气候约束较松地区，并鼓励其他国家提高生产清洁度。

欧盟声称 CBAM 设计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此，CBAM 在结构上与欧盟 ETS 高度对齐：进口商所承担的碳成本不得高于欧盟本土生产商在 ETS 下的成本。如果进口商在原产国已缴纳碳价，相应金额可从应纳费用中扣除，避免重复征收。CBAM 对所有来源国的同类进口产品一视同仁，只根据碳含量征税；同时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成员国或等效碳定价机制国家的产品实行减免豁免，以满足 WTO 下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非歧视要求。此外，欧盟计划逐步取消对本土企业的免费配额，以进一步保证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成本对称。尽管如此，多个贸易伙伴怀疑 CBAM 实质上是单边的域外监管举措，可能实质上歧视其出口产品。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已在 WTO 层面提出会同欧盟协商，声称若 CBAM 不能适用 GATT 第 XX 条等例外，可能违反了 GATT 义务。

（二）投资义务的潜在冲突

CBAM 主要针对已经或计划出口向欧盟市场供应碳密集产品的外国企业。这意味着，一旦实施，已有海外投资者可能因成本上升或市场份额减少而据此提起投资条约仲裁，声称其投资权利被侵害。例如，如果某投资者来自一国，该国与欧盟某成员国签有投资协定，该投资者可以声称 CBAM 对其投资构成歧视：国民待遇 / 最惠国待遇（NT/MFN）或公平公正待遇（FET）条款可能受到挑战。具体情景包括：

非歧视权（NT/MFN）：假设该投资者的竞争对手来自另一个排放定价国家，后者的产品因此在 CBAM 下免税，但其产品被征税，那么投资者可能主张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与其他外国投资者相比）。或者，如果该投资者所在国未实行碳定价，则进口商被要求额外缴纳碳价，造成其产品成本上升，而欧盟国内生产商不受此影响，则投资者可能声称遭到了与国内生产商不平等的待遇。

公平公正待遇（FET）：CBAM 政策改变了原有的监管环境与收益预期。许多重工业投资是在假定贸易环境开放、没有额外碳边境成本的基础上作出的。突然实施 CBAM 并增加出口成本，投资者可能声称这一决定具有任意性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其合理预期。需要注意的是，欧盟会回应说，自 2015 年《巴黎协定》以来强化气候监管已成预见，而 CBAM 立法过程公开、过渡期长，给予投资者适应期。

间接征收：投资者或声称，CBAM 相当于对其投资资产或收益的间接征收。若一项征税措施（如高额碳税）足以侵蚀投资者在欧盟出口业务上的大部分经济利益，可构成实质性征收，需要国家予以赔偿。CBAM 对碳密集产品征收成本，同样可能被诉诸此类论证，认为它“取走”了投资所期待的收益。

过往仲裁案例表明，尽管仲裁庭可能对出于公共利益的非歧视、比例适当的环保法规表示理解（Methanex 案、Chemtura 案都体现了类似原则），但它们并不自动将环保目的视为免除条约义务的充分理由。例如在 Eco Oro 诉哥伦比亚案中，三位多数意见法官承认哥伦比亚调整矿区（圣塔尔班高山）为保护水资源是合理的环保目标，却最终判定哥伦比亚违反了对投资者的最低待遇义务。同样，在 Bear Creek 诉秘鲁案（2017 年）和 Tecmed 诉墨西哥案（2003 年），仲裁庭均认可国家的环保政策目的，但由于条约中缺乏明确的环保例外条款，仍判决被告国承担责任。即使条约包含类似 CETA 般的环境豁免条款，仲裁庭往往要求被诉国满足极高的证明标准，如必要性证明和缺乏可行替代方案。这表明，在没有明确、专门针对气候措施的条款情况下，传统 IIA 框架下的仲裁判例并不保证国家完全

免责。此外，CBAM 还涉及税收与监管的法律定性问题：一些 IIA 对税收措施有特殊规定或豁免（如某些协定规定税务争议须先行国内税务程序），若 CBAM 被认定为“税收”，这些豁免条款可能适用。但 CBAM 本质是一种要求购买碳配额的法规，而非直接征收税收，为争议留下了法律空间。举例来说，CETA 中确有税收措施豁免条款，若 CBAM 被视为税款，该豁免或许可以阻止投资者的某些索赔；但如认定为一般监管行为，则不适用该条款，使相关索赔仍可提起。

综上，CBAM 的推出可能导致投资者援引国民待遇、FET 和征收等条款提出索赔。这些争议能否成立，将取决于具体条约条文和事实情况。从欧盟角度看，它主张 CBAM 为一般适用的非歧视环保措施。但投资者视角看，此政策针对特定行业，对依赖免碳成本出口的企业影响更大。未来如果就 CBAM 类措施提起仲裁，国家将如何为其行为辩护成为关键，而传统的投资协议下的例外条款或法理抗辩能否充分保护此类气候政策，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根据国际投资协定为气候措施辩护：CBAM 与必要性原则

如果投资者根据投资协定就 CBAM 提起仲裁，被诉国（如欧盟成员国）会首先考察适用的投资协定是否含有类似一般例外的条款，能够涵盖此类环保措施。早期 BIT 往往未明确将环境保护或跨境碳关税之类的政策排除在义务范围之外。可能的条款形式包括允许采取“为保护人、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或为保护自然资源、保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措施等。如果协定文本中含有类似 GATT XX(g) 精神的措辞，被诉国可能主张 CBAM 旨在保护“可持续的清洁空气”并与国内减排措施配套。然而，如果条约未明文纳入此类条款，仲裁庭通常不会自行扩张协定范围。某些 IIA 对税收措施作出排除——若 CBAM 被认定为“税收”，理论上此类条款可使相关索赔无效。但在多数情况下，没有针对性规定时，被诉国只能诉诸更为笼统的法律抗辩，如《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第 25 条下的必要性原则（或如协定有国家安全条款时的相关抗辩）。

必要性原则要求国家面临对其基本利益造成“紧迫而严重的危险”，所采取的措施又是避免该危险的唯一可行途径才可免责。应用到气候领域，国家会主张气候变化威胁国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水资源、粮食安全、沿海领土等），碳定价和 CBAM 等手段是全球应对这一危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反方（以及据经验多数仲裁庭）可能认为：虽然气候变化重要，但其危害呈长期累积态势，难以界定为传统意义上的“紧迫状态”；而且还存在多种其他减缓和适应途径（国内减排措施、国际合作、绿色技术补贴等），不应简单归结为“唯一选择”。因此，严格的必要性检验标准很可能难以通过：气候变化虽严重，恐难满足仲裁庭对“紧迫性”和“唯一途径”的高要求。

我们可借鉴阿根廷金融危机系列案中的经验。在 2001 - 2002 年危机期间，阿根廷多次援引必要性抗辩，声称紧急措施是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避免国家崩溃的唯一方法。但在 CMS 诉阿根廷案中，仲裁庭拒绝接受必要性抗辩，并指出阿根廷自身政策也助长了危机，不满足 ILC 规则的要求。恩隆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亦持类似观点。相反，在 LG&E 诉阿根廷案（2006）中，一个仲裁庭更为宽容，认为阿根廷确处于必要状态，并暂时不追究其条约违约责任（危机解除后义务恢复）。该庭甚至指出，在特殊危机下，国家享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这一分歧表明，在非同寻常情形下，有仲裁庭会对国家处境给予考虑，但分歧也说明并非所有仲裁员都会放宽标准。相比阿根廷金融海啸那种突发急剧危机，气候变化属于慢性而长期的威胁。多数仲裁庭可能不愿意承认可持续数十年的气候危机属于条款

意义上的“紧迫状态”，从而接受必要性抗辩。

即使某仲裁庭接受国家的必要状态主张，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依据 ILC 条款 25，如果国家处于必要状态，其违法行为被视为免责，即不构成违约，因此不必支付赔偿。但投资条约中往往明确要求对征收进行赔偿；部分仲裁庭甚至认为这一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优先于习惯国际法的必要性条款。在 LG&E 案中，仲裁庭接受了暂时免责，但只在责任认定上延期，最终仍要求履行赔偿义务；在其他仲裁（如伊朗与投资者案）中也出现过必要性抗辩被接受但仍判决赔偿的情况。换言之，即便承认气候必要性，仲裁庭可能仍在衡平或赔偿阶段进行考量。总之，就 CBAM 而言，被诉国援引必要性原则将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可能争取与 LG&E 案类似的同情性裁决，另一方面需证明气候危机满足极端必要性的所有条件。鉴于 CO₂ 排放限制的长期性和多种替代方式，仲裁庭极有可能对必要性抗辩不予通过。

综合来看，在现行 IIA 框架下，很难对 CBAM 这类措施提供全面免疫。除非相关条约专门为气候措施或碳定价规定豁免，否则若投资者提起索赔，国家仅能依赖一般性例外条款或国际法抗辩，而这两者的保护都十分有限。如果仲裁庭认为 CBAM 违反了投资义务，即便国家出于气候考虑立场正当，也可能被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结果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背道而驰。正因为这种矛盾，学界和部分国际组织呼吁对投资协定进行改革。一些建议包括：在协定中加入明确的气候保护例外条款（如对碳定价、化石燃料淘汰等措施豁免）；对“受保护投资”或条约义务进行重新定义，将高碳业务预期排除在外；在条约序言或解释性声明中引入《巴黎协定》内容，指示仲裁庭在认定 FET 时考虑气候因素，以便投资者预见到更严格气候政策的可能性。同时，也可在条约中积极支持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投资，如提供保护或奖励，促进投资法与气候政策的协调发展。此外，设计方面还可以考虑程序创新：如对核心气候政策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或选择性），或要求先在国内层面解决争议（将气候法视为紧迫国际义务），以减少投资者直接仲裁的途径。

五、结论

气候变化已成为检验国际投资体制能否容纳必要公共政策措施的“试金石”。研究表明，尽管新一代投资协定开始纳入环境保护例外条款并重申国家管制权，但至今仲裁庭对这些条款的实际运用仍十分有限。在绝大多数传统 BIT 中，环境例外条款很少，其覆盖范围通常局限于非常高的要求；国际习惯法中的必要性抗辩也被严格限制，仲裁庭往往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承认其适用。迄今的判例显示，国家几乎不可能仅依赖这些条款完全免责：仲裁庭通常要么认为某一环保措施合情合理且非歧视，因此不构成条约违约，要么认定存在违约同时仍判国家承担责任（并可能要求赔偿），尽管它认可该措施的公共利益目标。例如，尽管 Eco Oro 案和 Bear Creek 案中仲裁庭都承认了环保目的，但由于条约未提供明确豁免，仍判国家承担违约责任。欧盟 CBAM 等措施正处于现代气候政策的核心，其符合环保目标，却可能被传统投资法视为侵犯投资者权利，除非条约语言明文豁免。

其结果是，各国推进激进气候行动时仍面临实质法律风险。即便个别国家在仲裁中胜诉，从启动仲裁到最终裁决漫长过程及潜在赔偿，也足以产生监管寒蝉效应，使政策执行停滞或弱化。这样的结果与《巴黎协定》等国际承诺所要求的雄心勃勃气候行动背道而驰。分析表明，如果不对现有投资协定进行改革，气候政策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冲突只会加剧。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所指出，要实现气候目标，很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国际投资协定，确保它们不会无意阻碍环境行动。学者们建议通过“气

候豁免条款”、为气候政策提供单独保护（如在条约中专门声明某些环境措施不受 ISDS 审查）、或限制保护高碳投资等方式对 IIA 进行重新校准。与此同时，还可以强化对可持续投资的支持，例如在协定中加入保护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的条款，平衡历史上对化石燃料投资的绝对保护，促使投资法与向低碳转型的目标一致。

总而言之，当下的国际投资法律框架仍倾向于保护投资者权利，而对气候政策的法律支持有限。传统条约例外和必要性原则充其量只能为采取 CBAM 等措施的国家提供有限且不确定的保护。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改革行动，国家可能会被迫为实施保护地球环境所必需的气候措施付出法律和经济代价，这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是悖论。正因如此，UNCTAD 等国际机构已强烈呼吁修订投资协定：纳入明确的气候保护条款、确认国家行使管制权的权利，以及创造鼓励可持续投资的新机制。只有通过现代化投资条约——打破对投资者保护的绝对主义——国际社会才能确保像 CBAM 这样的气候行动不仅在环境和贸易领域合理合法，而且在投资法律框架下也能得到保障。可供采取有意义气候行动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关闭，投资法律框架必须与之同步调整，使维护宜居气候与维护投资法治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冲突。

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R]. 2015: 107.
- [2] Henckels C. Protecting Regulatory Autonomy through Greater Precision in Investment Treaties: The TPP, CETA, and TT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6, 19(1): 27-53. DOI:10.1093/jiel/jgw001.
- [3]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anada - European Union. Signed 30 October 2016, [2017] OJ L 11/23, arts 8.9, 8.15.
- [4] China - 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tralia - China. Signed 17 June 2015, entered into force 20 December 2015, ch 9 art 9.11.
- [5] African Union. Draft Protocol on Investment to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2023), art 23.
- [6]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ada - Mexico - United States. Signed 17 December 1992, entered into force 1 January 1994, art 1114.
- [7] Burke-White W W, von Staden A.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48(2): 307-410.
- [8] Tienhaara K. Regulatory Chill and the Threat of Arbitration: A View from Political Science[C]//Brown C, Miles K (eds).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06.
- [9]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EB/OL]. (2023).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_en.

- [10] European Commissio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Questions and Answers[EB/OL]. (2022-12-13).
- [11]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OM(2021) 564 final[EB/OL]. 14 July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1PC0564>.
- [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47)[Z]. 55 UNTS 194, arts I, III.
- [13] DiMascio N, Pauwelyn J. Nondiscrimin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Treaties: Worlds Apart or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102(1): 48-89.
- [14] Brauch M D, et al. An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for Climate-Aligned Investment Governance[EB/OL]. (2024). SSRN.
- [15] Perez-Aznar F. The Use of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s to Import Substantive Treaty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7, 20(4): 777-803.
- [16] Montinaro G. Climate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EB/OL]. (2024).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5339153.
- [17] Alschner W, Türk 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Fost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 (2013).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95440.
- [18] Fermeglia 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SDS[EB/OL]. (2024). SSRN.
- [19] Quirico O. From Investment Protection to Sustainability (via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C]//Architectur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Springer, 2023.
- [20]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47), art XX(g).
- [21] Viñuales J 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C]//Miles K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Law. Edward Elgar, 2016: ch 2.
- [22] Bjorklund A K. Emergency Exceptions to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the Realm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State of Necessity and Force Majeure as Circumstances Precluding Wrongfulness[C]//Muchlinski P, Ortino F, Schreuer C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95-523.
- [23] Paddeu F, Waibel M. Necessity 20 Years On: The Limits of Article 25[J]. ICSID Review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2022, 37(1-2): 160-186.

Balancing Climate Policy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Exceptions in IIAs and the EU's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WANG Hanbin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NSW, 2052

Abstract: As the global climate crisis intensifies, states are advancing unprecedented climate policies such as carbon pricing,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 and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However, these measures often come into structural conflict with investor protection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sse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exception clauses, regulatory space provisions and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octrine of necessity in safeguarding state climate measures. It argues that traditional IIAs generally lack explicit climate-related carve-outs and that arbitral tribunals have tended to interpret environmental exceptions and necessity defences narrowly, thereby exposing states to significant legal risks when implementing decarbonisation regulations. Using the EU's CBAM as a case study, the article shows how carbon border measures may trigger investor claims based on national treatment,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 an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revealing deep-seated institutional tensions within the investment law regime when confronted with cross-border climate policies.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reform is needed through textual revision of IIAs, the introduction of dedicated climate exceptions, a recalibration of investo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nd a stronger affirmation of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be realigned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broade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framework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Environmental Exceptions; Climate Chang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版权所有 © 2025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